

地位、相对剥夺与归因： 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机制

孙薇薇 朱晓宇

内容提要：基于结构地位、相对剥夺、归因理论三大视角，本文运用 CGSS2010 数据研究了教育年限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路径。本研究基本否定了“结构地位决定论”这一影响路径，转而支持“相对剥夺理论”和“归因理论”路径。教育无法因收入提高、地位提升显著增加民众的分配公平感，结构地位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同样的相对剥夺条件下，教育水平越高，分配公平感越低。个体纵向社会流动显著增加了教育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随着人们向下流动幅度越大，教育水平越高，分配公平感越低。此外，将成就归因于努力显著降低了教育对分配公平感的负向影响；将不平等归因于特权显著增加了教育对分配公平感的负向作用。这一发现有利于解释既有研究的矛盾结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涵：当教育作为制度化手段无法实现地位获得这一目标，将成就归因于努力的高教育水平群体无法仅凭努力获得个体向上流动时，就会引发“分配不公”的心理失范。

关键词：教育年限；分配公平感；结构地位；相对剥夺；归因理论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分配机制由再分配下的平均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按劳分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同的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单位类型之间民众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急剧扩大的不平等引发了社会普遍的不满情绪，群体突发事件层出不穷。然而，现实层面的收入差距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得到根本性解决，且分配不平等程度严重与否、后果如何，最终取决于公众的主观感受和价值性判断。因此，认知层面的公平问题对当今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影响更深，且更亟待解决。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获益者和受损者逐渐明晰，人们对分配公平的认识日益分化。对分配产生不公平感的群体不一定是实际利益受损的群体，也不一定是社会弱势群体，而是主观感知到自身利益受损的群体。考察分配公平感较低的群体特征，以防止社会不满情绪积压，“社会火山”爆发，从而降低社会风险。过往研究普遍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对分配公平感进行考察，教育，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对分配公平的认知具有重要影响，但教育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机制尚存争议。

作者简介：孙薇薇，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电话：13910269726；朱晓宇，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研究生。

基金项目：中央财经大学“青年英才”培育支持计划。

因此,教育与分配公平感之间有何关系,其影响分配公平感的机制是什么,将作为本文主要的研究问题。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近年来,有关我国民众对分配公平认知情况的学术讨论日益受到关注,并出现了一批颇具代表性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分配公平观”研究(李骏、吴晓刚,2012)、“宏观分配公平感”研究(怀默霆,2009;王甫勤,2011)和“微观分配公平感”研究(李颖晖,2015;马磊、刘欣,2010;孟天广,2012;王甫勤,2010)。“分配公平观”研究的核心议题是人们认为怎样的分配原则是公平的,即哪些人更赞同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尽可能小,而哪些人更赞同收入差距尽可能大。“分配公平感”研究的核心议题是哪些人认为现实的资源分配状态是公平的。有学者将全社会范围内资源分配的公平称为“宏观公平”(macro-justice),将针对个体的资源分配的公平称为“微观公平”(micro-justice)(Brickman et al., 1981),因此“分配公平感”又可以被区分为“宏观分配公平感”和“微观分配公平感”。在已有研究中,“宏观分配公平感”研究主要探讨哪些人认为目前我国的的不平等状况(贫富差距)是过度的或有害的;“微观分配公平感”研究主要探讨哪些因素会使人们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公平的(赵晓航,2015)。基于此,本文探讨的是人们的教育年限对微观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机制,由结构地位、相对剥夺以及归因类型三种视角分别展开。结构地位决定论与相对剥夺理论作为教育程度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机制已在李颖晖(2015)文章中详细提及,但为保持本文结构更加完整,并与此文交叉验证这一问题,本文对上述两种理论解释再次进行梳理。

(一)结构地位决定论

“结构地位决定论”假设:人们基于自利动机,作为获益者,既得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其倾向于认为当前的资源分配是公平的,承认其合法性。而若是利益受损者,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则更容易不满于分配现状,希望得到资源的转移和补偿。因此,该理论认为,分配公平感是由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分配公平感越强。基于此,在“结构地位决定论”的框架中,学者普遍认为,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群体,越有可能获得优势社会经济地位,继而认为自身获得的分配地位是公平的。刘欣(2002)在其早期研究中发现,在高速率的改革之下,更高教育程度的群体更容易成为改革的获利者,处于优势地位,并且维护既得利益,从而较少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剥夺;李骏、吴晓刚(20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收入与职业地位对分配公平感有正向效应,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认可更多的不平等。在此,不妨延续这一思路,将教育视为一种既得优势地位的获取途径,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便表现为教育年限→结构地位获得→分配公平感的路径,即,

假设 1a: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

假设 1b: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

假设 1c:随着收入提高、社会阶层地位上升,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群体越倾向认为自己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即教育以结构地位提高增强分配公平感。

(二)相对剥夺理论

研究表明,结构地位决定论并非总是有效的,马磊(2010)否定了“结构地位决定论”观点,认为分配公平感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而变得更强大,二者之间并非线性关系。并且本文所研究的分配公平感是基于主观评测下的个人感受,仅仅依靠客观指标是无法对其进行完全解释的。满足同一客观指标的

人很多,比如生活在同一地区且年收入相当的群体,但其分配公平感却不尽相同。因此研究分配公平感还应从人们各自的生活经历出发,向个体的主观心理进行转变,即采用相对剥夺理论视角。

相对剥夺理论是指个人内心的福祉不仅仅取决于其拥有资源的绝对数量,更在于其所感知到的相对数量。即使拥有大量资源,但其不论是与参照群体相比还是和自己纵向相比,资源数量是相对低的或下降的,或者所得达不到内心期待,个人便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这就引出了产生相对剥夺的三种途径:(1)与参照群体的横向对比。伯格(Berger, 1972)指出,个体通过将自身所获得的资源,同现实可比的参照群体所获得的资源相比,如若一致,则认同资源分配结果,若不相符,便会感到相对剥夺,产生不公平感;(2)个体自身的纵向对比。如格尔等人强调纵向比较对被剥夺感的形成的重要影响(Gurr, 1970),之后的研究更多将其演绎为人们对当下和过去对比所形成的向上、向下流动的感受,或是个人生命历程中(尤其是职业流动)的社会流动状况(怀默霆, 2009; 马磊、刘欣, 2010; 王甫勤, 2011),后者被认为在公平感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李颖晖, 2015)。王甫勤(2010)认为,获得向上流动的高教育程度者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3)个人期待与其现实所得形成的落差。长期以来,通过获得高教育水平,实现“鲤鱼跃龙门”,获得地位与财富等资源回报几乎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普遍共识(李春玲, 2003)。因此,不应仅仅将教育视为一种优势地位的获得,更应将教育视为一种指向地位获得的投入。人们对投入普遍是期待回报的,教育水平越高,其对教育投入越多,对教育带来经济地位方面回报期待越大。因而产生的自我预期与实际收入的差距对分配公平感有显著影响,即教育程度越高,随着期待的收入与实际的收入差距扩大,分配公平感下降幅度越大(李颖晖, 2015)。此外,教育具有发展认知、培养动机继而启蒙自我意识与现代性的潜在功能(李骏、吴晓刚, 2012)。因此,教育水平越高,越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更加关注投入回报比,对公平更加敏感,具有更强的批判意识。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 2a:随着个体向上流动的等级提升越多,受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更可能认为收入分配公平。

假设 2b:随着预期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距扩大,受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认为收入分配公平的概率更低。

(三)归因理论

以往研究主要从分配结果入手,通过探讨既得社会地位或对已得资源进行社会比较分析人们的分配公平感(李颖晖, 2015; 马磊、刘欣, 2010; 孟天广, 2012)。但是,人们在评判资源分配是否公平时不仅要考虑分配结果,即得到了什么或得到了多少;还要考虑分配过程,即为什么能够得到(Verwiebe & Wegener, 2000)。因此,人们对分配过程的认知也会影响其分配公平感。人们对成就的归因就体现了对个体分配过程的认识,当人们越倾向于将所获成就归因于个人能力、努力程度等内因时,越可能认为分配是公平的;反之,当人们认为个体所获成就主要依靠运气、体制等外部因素,靠内在能力无法取得时,越可能认为分配是不公平的。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表征之一,具有自致的特点,即可将教育水平越高视为其对达到个人成就越努力,越认可个人成就的努力归因。此外,对不平等的归因也是如此。有研究证明,人们对不平等的归因会影响他们对分配公平性的判断(王甫勤, 2010, 2011; Ng & Allen, 2005; Whyte & Han, 2008),当人们越倾向于将不平等的归因于特权时,更可能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不公平的(赵晓航, 2015)。教育程度越高,其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内因的相对优势也越高(王甫勤, 2010)。将归因取向不同作为教育对微观公平感的影响机制的探讨相对不足,本文将在这些方面做出改进,综合成就归因和不平等归因,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 3a:随着个人将成就更多地归因于努力,受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越可能认为收入分配是公平的。

假设 3b:随着个人将成就更多地归因于运气,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群体认为收入分配公平的概率越低。
假设 3c:随着个人将不平等更多地归因于特权,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群体认为收入分配公平的概率越低。

二、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项目 2010 年数据。该数据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全国共抽取 100 个县级单位加 5 大都市,480 个村/居委会,12000 名个人,样本总量为 11783 个。本文以当时从事工作的 18 岁至 60 岁受访者为研究对象,实际进入模型的有效样本为 5798 个。

(二)变量设计

本文的因变量为分配公平感。对该变量的现有测量方法有基尼系数法、主观评估法和量表法等(王甫勤,2010)。本文采用的是主观评估法,具体而言,CGSS2010 问卷中有一道题目是询问被访者“考虑到您的教育背景、工作能力、资历等各方面因素,您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是否公平?”,从而以此来获得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认知状况。备选项则包括“不公平”到“公平”五个测度。将“不公平”、“不太公平”合并为“不公平”(=0)，“一般”仍作为中立项“一般”(=1)，“比较公平”、“公平”合并为“公平”(=2),以此代表社会成员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状况。

教育年限以及其与结构地位因素、相对剥夺因素、归因因素的交互效应作为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对其进行重点考察。教育年限是通过被访者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折算的。“结构地位决定论”所涉及的相关变量,如个人年收入、社会阶层地位以及其与教育年限的交互项也被纳入自变量的范畴;相对剥夺论所涉及的相关变量,如个人社会流动和预期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距及其与教育年限的交互项,以及归因理论所涉及的相关变量,即成就归因中的努力和运气因素变量和不平等归因中的特权因素变量及其与教育年限的交互项,也用于探讨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机制。

年龄、性别、户口类型、政治面貌、时代、地区因素等个人特征与社会环境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具体的变量描述见表 1。

(三)研究方法

根据因变量的多分类性质,研究使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本文以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感的直接影响为基准模型,引入个人年收入、社会阶层地位等结构地位变量,预期公平收入与现实收入的差距、个人纵向社会流动等相对剥夺变量,成就归因、不平等归因等归因理论变量,在对数据进行地区加权处理的基础上,建立包含四个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的嵌套模型。

三、结果分析

表 2 是教育年限影响分配公平感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考虑到该表的复杂程度,将只对该表所显示出来的总体模式以及各模型中的核心自变量进行重点分析,将不对每个系数进行逐一说明。模型 1 中,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感的直接影响体现在,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人们对自己目前收入分配认为“一般”比认为分配不公平的概率增加了 3.5%。此外,在未加入其他核心自变量时,教育年限对分配感到公平

表1 变量描述(N=5798)

变量	均值/百分比(%)	说明
分配公平感		
不公平	43.85	不公平=0,一般=1,公平=2
一般	27.84	
公平	28.31	
教育年限	9.48	标准差 4.23
个人年收入	9.37	ln(个人年总收入) 标准差 1.10
社会经济地位		
下层	39.98	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于哪一档?
中层	51.55	远低于/低于平均为下层,平均水平为中层,高于/远高于平均为上层,分别编码为0—2
上层	8.47	
预期与实际收入差距		
低预期	4.45	ln(预期公平收入/实际收入)<0
预期相等	9.16	ln(预期公平收入/实际收入)=0
高预期	86.39	ln(预期公平收入/实际收入)>0
主观社会流动		
向下流动	14.56	目前等级-10年前等级<0,现在比过去等级低
无变化	31.42	目前等级-10年前等级=0,现在与过去持平
向上流动	54.02	目前等级-10年前等级>0,现在比过去等级高
未来预期流动		
向下流动	4.71	10年后等级-目前等级<0,未来比现在等级低
无变化	26.68	10年后等级-目前等级=0,未来比现在持平
向上流动	68.61	10年后等级-目前等级>0,未来比现在等级高
成就归因于努力	4.40	个人的成就大部分是靠努力争取的? 1(不认同)-5(认同),标准差 0.76
成就归因于运气	2.81	个人的成就大部分是靠运气? 1(不认同)-5(认同),标准差 1.15
不平等归因于特权	3.45	社会不平等主要是由一小部分掌权者的控制、操纵造成的? 1(不认同)-5(认同),标准差 1.13
年龄	41.96	2010-出生年份,标准差 10.53
性别		
男性	53.33	男性=1,女性=0
女性	46.67	
户口类型		
非农业	45.93	非农业=1,农业=0
农业	54.07	
政治面貌		
党员	12.26	共产党员和民主党员=1,共青团员和群众=0
非党员	87.74	
时代		
1978年以前	26.81	根据上大学年龄(即=出生年代+18)划分
1978-1992年	45.17	1978年前=0,1978-1992年=1,1993及年以后=2
1992年以后	28.02	
地区		
东部	37.84	
中部	33.65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划分标准对相应省份进行划分,分别编码为0-2
西部	28.51	

并没有显著影响。假设 1a 无法得到证实。一方面这表明,教育水平越高,对社会认知较为复杂,态度倾向不明,极少作出极端的公平感选择,体现教育对公平感有“中庸”式影响。另一方面,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感确实存在影响,但是其影响的方向以及机制较为模糊不清。“一般”这一话语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意涵,仅凭模型 1 无法断定选择“一般”的群体究竟是处于“既不觉得公平也不觉得不公平”的位置,还是出于不喜表达态度倾向的矜持和顾虑、对现实的隐忍和磨合,抑或出于其他各种因素间的复杂交织。而这部分群体数量多、占比大,不能因暂时的信息不足而不将其考虑在内。因而,剥离出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方向和机制需要更进一步的工作。

模型 2 中,在模型 1 的基础之上,重点考察结构地位因素与教育年限的交互效应。在加入包含收入、地位在内的核心变量后,随着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人们认为分配公平比认为分配不公平的概率降低了 6.7%。在个人年收入小于 1164.02 元时,分配公平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显著降低;在个人年收入大于 1164.02 元时,分配公平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显著上升。社会阶层地位中,并非社会阶层越高越倾向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对比下层群体,中层群体认为分配公平的概率增加了 0.98 倍,而上层群体结果并不显著。个人年收入、社会阶层地位与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并不显著,结构地位在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中不具有调节效应。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受教育水平不同的群体在同等收入、地位水平下,社会分配公平感是具有显著差异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分配公平感越低。在控制了个人年收入以及社会阶层地位等代表结构地位的变量之后,受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感之间的显著性关联才体现出来,一定程度上说明结构地位在教育年限与分配公平感之间起了中介作用。然而,由于结构地位与分配公平感之间并非线性关系,受教育水平高的群体并非随着收入增长、地位升高而更可能认为目前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因此,假设 1b、1c 被拒绝,结构地位决定论的观点无法成立。

模型 3 中,在模型 2 的基础之上,考察相对剥夺因素与教育年限的交互效应。在加入包含预期公平收入与实际收入差距、个人纵向社会地位流动的核心变量之后,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感的负向作用增强。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相比于分配不公,认为分配公平的概率下降了 13.2%。当预期公平收入与现实收入相等时,民众更可能认为收入分配公平,其次是预期公平收入低于实际收入,而预期公平收入高于现实收入群体的分配公平感则显著低于前两者。预期公平收入与现实收入差距与教育年限的交互效应并不显著。假设 2b 无法得到验证。个人纵向的社会流动与教育年限的交互效应表明,随着个人向上流动,受教育年限越长,认为分配公平的概率显著扩大。此时收入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减弱。假设 2a 得到验证(见图 1)。

表 2 教育年限影响分配公平感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N=5798)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教育年限		教育年限+结构地位		教育年限+相对剥夺		教育年限+归因	
一般								
教育年限	1.035**	(0.012)	0.998	(0.017)	1.004	(0.065)	1.010	(0.066)
个人年收入			0.406	(0.201)	0.581	(0.278)	0.551	(0.270)
个人年收入平方			1.065*	(0.029)	1.041	(0.027)	1.045	(0.028)
个人年收入*教育年限			1.018	(0.010)	1.021*	(0.010)	1.019	(0.010)
社会阶层地位(下层为参照)								
中层			1.935***	(0.368)	1.826**	(0.350)	1.785**	(0.345)
上层			1.319	(0.546)	1.181	(0.497)	1.108	(0.470)

(续表2)

自变量	模型1 教育年限		模型2 教育年限+结构地位		模型3 教育年限+相对剥夺		模型4 教育年限+归因	
社会阶层地位*教育年限								
中层*教育年限			1.012	(0.019)	1.013	(0.019)	1.013	(0.019)
上层*教育年限			1.037	(0.037)	1.044	(0.038)	1.044	(0.038)
预期与现实收入差距(低预期为参照)								
预期相等					4.040	(3.017)	4.613*	(3.517)
高预期					0.824	(0.416)	0.905	(0.462)
预期与现实收入差距*教育年限								
预期相等*教育年限					1.006	(0.073)	0.998	(0.073)
高预期*教育年限					0.971	(0.048)	0.969	(0.048)
主观社会流动(向下流动为参照)								
无变化					1.013	(0.339)	1.049	(0.350)
向上流动					1.462	(0.452)	1.442	(0.447)
主观社会流动*教育年限								
无变化*教育年限					1.022	(0.031)	1.019	(0.031)
向上流动*教育年限					1.000	(0.028)	1.000	(0.028)
未来预期流动(向下流动为参照)								
无变化					1.288	(0.624)	1.305	(0.626)
向上流动					1.084	(0.500)	1.048	(0.479)
未来预期流动*教育年限								
无变化*教育年限					1.008	(0.044)	1.004	(0.043)
向上流动*教育年限					1.028	(0.042)	1.029	(0.042)
成就归因于努力							1.119*	(0.052)
成就归因于努力*教育年限							0.990	(0.011)
成就归因于运气							1.043	(0.032)
成就归因于运气*教育年限							1.007	(0.008)
不平等归因于特权							0.812***	(0.026)
不平等归因于特权*教育年限				0.999	(0.008)			
控制变量								
年龄	0.969	(0.035)	0.961	(0.036)	0.969	(0.037)	0.968	(0.038)
年龄平方	1.000	(0.000)	1.000	(0.000)	1.000	(0.000)	1.000	(0.000)
性别(女性为参照)	0.983	(0.069)	0.956	(0.072)	0.967	(0.073)	0.967	(0.074)
户口(农业户口为参照)	0.737***	(0.063)	0.684***	(0.063)	0.725***	(0.068)	0.736**	(0.069)
政治面貌(非党员为参照)	0.955	(0.107)	0.770*	(0.091)	0.766*	(0.091)	0.753*	(0.090)
时代因素(1978年前成人为参照)								
1978—1992年成人	1.235	(0.220)	1.217	(0.222)	1.193	(0.220)	1.174	(0.217)
1993年及以后成人	1.514	(0.395)	1.411	(0.378)	1.394	(0.377)	1.383	(0.376)
地区因素(东部为参照)								
中部	0.930	(0.077)	1.054	(0.092)	1.037	(0.092)	1.022	(0.092)
西部	0.719***	(0.068)	0.826	(0.083)	0.800*	(0.082)	0.794*	(0.082)

(续表2)

自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教育年限		教育年限+结构地位		教育年限+相对剥夺		教育年限+归因	
教育年限	1.011	(0.011)	0.943***	(0.015)	0.868*	(0.055)	0.879	(0.059)
个人年收入			0.215**	(0.108)	0.460	(0.220)	0.436	(0.213)
个人年收入平方			1.115***	(0.031)	1.061*	(0.028)	1.064*	(0.029)
个人年收入*教育年限			1.001	(0.010)	1.010	(0.010)	1.011	(0.010)
社会阶层地位(下层为参照)								
中层			1.980***	(0.357)	2.026***	(0.394)	1.978***	(0.393)
上层			2.066	(0.815)	2.070	(0.831)	2.105	(0.839)
社会阶层地位*教育年限								
中层*教育年限			1.024	(0.019)	1.019	(0.020)	1.019	(0.021)
上层*教育年限			1.048	(0.037)	1.046	(0.038)	1.039	(0.037)
预期与现实收入差距(低预期为参照)								
预期相等					6.072**	(4.169)	7.071**	(5.049)
高预期					0.294**	(0.137)	0.319*	(0.154)
预期与现实收入差距*教育年限								
预期相等*教育年限					1.030	(0.069)	1.020	(0.071)
高预期*教育年限					0.993	(0.046)	0.994	(0.048)
主观社会流动(向下流动为参照)								
无变化					0.548*	(0.165)	0.586	(0.181)
向上流动					0.569*	(0.163)	0.575	(0.168)
主观社会流动*教育年限								
无变化*教育年限					1.065*	(0.031)	1.060*	(0.032)
向上流动*教育年限					1.078**	(0.030)	1.075*	(0.030)
未来预期流动(向下流动为参照)								
无变化					0.986	(0.440)	1.149	(0.534)
向上流动					1.080	(0.462)	1.107	(0.492)
未来预期流动*教育年限								
无变化*教育年限					1.037	(0.044)	1.022	(0.045)
向上流动*教育年限					1.048	(0.042)	1.045	(0.044)
成就归因于努力							1.527***	(0.094)
成就归因于努力*教育年限							0.963**	(0.013)
成就归因于运气							0.919*	(0.032)
成就归因于运气*教育年限							1.006	(0.008)
不平等归因于特权							0.786***	(0.027)
不平等归因于特权*教育年限							0.982*	(0.008)
控制变量								
年龄	0.947	(0.034)	0.929*	(0.035)	0.962	(0.038)	0.964	(0.039)
年龄平方	1.001	(0.000)	1.001*	(0.000)	1.000	(0.000)	1.000	(0.000)
性别(女性为参照)	1.102	(0.077)	0.961	(0.073)	1.018	(0.083)	1.006	(0.083)
户口(农业户口为参照)	0.685***	(0.060)	0.591***	(0.057)	0.655***	(0.066)	0.675***	(0.069)
政治面貌(非党员为参照)	1.097	(0.124)	0.824	(0.099)	0.842	(0.106)	0.785	(0.101)

(续表2)

自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教育年限		教育年限+结构地位		教育年限+相对剥夺		教育年限+归因	
时代因素(1978年前成人作为参照)								
1978-1992年成人	1.124	(0.194)	1.097	(0.201)	1.017	(0.197)	0.991	(0.194)
1993年及以后成人	1.209	(0.312)	1.123	(0.304)	1.042	(0.296)	1.030	(0.296)
地区因素(东部为参照)								
中部	0.867	(0.077)	1.089	(0.103)	1.132	(0.114)	1.152	(0.116)
西部	1.446***	(0.127)	1.908***	(0.183)	1.852***	(0.186)	1.799***	(0.183)
pseudo R-sq	0.016		0.058		0.106		0.119	
BIC	13006.728		12585.243		12165.293		12099.517	

注：1.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p<0.05, **p<0.01, ***p<0.001。2. 报告值为优势比(odds ratio), 括号内为标准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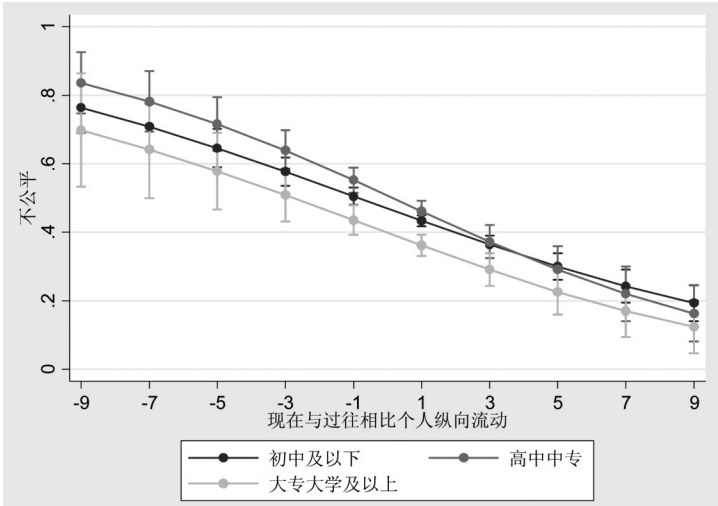


图1 个人纵向社会流动变化下的教育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

模型4中,在模型3的基础之上,考察归因类型与教育年限的交互作用。在加入包含成就归因与不平等归因在内的核心变量之后,模型3中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感既有的负向影响减弱,且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感的主效应不再显著。认同成就归因于努力的程度增加,就越可能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同时,认同成就归因于努力显著降低了教育年限对分配公平感的负向影响,即随着认同个人成就归因于努力的程度提高,教育水平越高的群体认为分配公平的概率增加。假设3a得到验证。将成就归因于运气,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所得是不公平的,但由于与教育年限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表明将成就归因于运气并不会改变教育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假设3b无法得到验证。将不平等归因于特权能够显著降低人们的分配公平感,随着对特权导致不平等的认同程度上升,受教育年限越长,越可能认为自己当前的收入所得是不公平的,假设3c得到验证。此外,预期收入与实际收入差距的主效应,以及个人纵向社会流动与教育年限的交互效应仍然显著。同时,基于伪R²的逐步提升发现,模型4相比基准模型1有了很大的改善。

控制变量中,农业户口比非农业户口更容易感到分配公平,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容易感到分配公平。这超越了既往常识,人们习惯于将农民当成改革的受损者,将西部地区视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想当然地以为这些因素会导致分配公平感的下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更可能是局部比较的结果,即农业人

口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低于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西部地区的内部不平等程度低于西部与东部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四、小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探讨验证了教育年限对微观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机制。本次研究基本否定了“结构地位决定论”这一观点,而支持“相对剥夺理论”和“归因理论”观点。教育并不能通过收入提高、地位提升显著增加人的分配公平感,一方面,结构地位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另一方面,当人们处于同样的结构地位之下时受教育年限越高,分配公平感反而是越低的。恰恰证明了人们基于优势地位回报对教育进行投入,投入越多,期待越大,公平感越低。同时,与自身纵向经历相比,与过往持平,或者向上流动的情况下,教育水平越高,分配公平感越高并且公平感增加更为强烈。部分是因为教育是主要依靠个人努力获得的自致因素,教育水平更高的人可能更加倾向于将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归因于自身努力,越是内在归因,越倾向于认为自己当前的收入是公平的。我们还应注意到,教育水平越高,随着对特权的批判意识更为强烈,越认为当前的收入是不公平的。

本次研究的研究成果与国内微观分配公平感早期研究成果呈现出较大区别。主要在于,高学历群体的分配不公平感是显著增加的,收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本身是无法平复人们心中不公平的情绪的。随着我国1986年将义务教育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990年后高等教育的扩张,人们的受教育年限普遍提高,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员数量和比重突飞猛进。教育扩张的幅度超出了就业岗位增长的幅度,就业岗位不足,低层次工作所需教育年限要求升级,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只好“屈就”于过去只需要低学历者就能胜任的工作,由此引发心理失衡。此外,高学历群体种种的心理落差不仅来源于学历贬值,更来源于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高速的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改革红利被瓜分完全,阶层逐渐固化,上升渠道日益堵塞,单单依靠努力获取高学历已很难打破阶层壁垒。由于普遍认为高学历人群擅长用社交媒体发声,我们很可能以为我们将真正底层的声音忽略。然而本次研究表明,社会弱势群体未必分配公平感就低。为分配感到不公的不一定是改革中实际的利益受损者,而是主观认知到自身利益受损的群体。这也是研究的意义所在。应找出积压不满情绪的群体,探讨其中原因,及时疏通民意,设置社会安全阀,防止“社会火山”爆发。

本次研究中,囿于数据限制,相对剥夺模型中未能纳入与他人横向比较这一十分重要的变量,社会流动不仅应考虑个人纵向流动,还应考虑代际社会流动;此外,本文主要研究了结构地位、相对剥夺、归因因素在教育与分配公平感中的调节效应,可以进一步改善模型来探索上述三种因素在教育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最后,可将研究横向拓展,加入不同福利制度国家的制度性比较,考察不同福利制度国家下,个人所受教育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机制。

参考文献:

- 怀默霆,2009,《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第1期。
郭星华,2001,《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3期。
劳婕,2012,《现实的差距与感知的公平:中国人公平感及其影响因素量化分析》,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李春玲,2003,《文化水平如何影响人们的经济收入——对目前教育的经济收益率的考查》,《社会学研究》第3期。
——,2006,《各阶层的社会不公平感比较分析》,《湖南社会科学》第1期。

- 李骏、吴晓刚, 2012,《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 2012,《“患不均,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 李颖晖, 2015,《教育程度与分配公平感:结构地位与相对剥夺视角下的双重考察》,《社会》第1期。
- 栗治强、王毅杰, 2014,《转型期中国民众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学术论坛》第8期。
- 刘欣, 2002,《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社会学研究》第1期。
- 马磊、刘欣, 2010,《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孟天广, 2012,《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分配公平感: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社会》第6期。
- 王甫勤, 2010,《社会流动与分配公平感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 2011,《当代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一项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英文),《社会》第3期。
- 谢宇, 2010,《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社会》第3期。
- 赵晓航, 2015,《转型期中国民众的分配公平感与不平等归因》,《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 Berger, Joseph, M. Zelditch, B. Anderson & B.P. Cohen. 1972, "Structural Aspect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 Status Value Formulation." *Sociological Theories in Progress* (2).
- Brickman, P., R.Folger, E.Goode & Y.Schul. 1981, "Macrojustice and Microjustice." *The Justice Motive i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Plenum Press.
- Gurr, T.R. 1970.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g, S.H. & M.W. Allen. 2005, "Perceptions of Economic Distributive Justice: Exploring Leading Theori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3(5).
- Verwiebe, R. & B.Wegener. 2000,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Perceived Income Justice Gap."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3(2).
- Whyte, M.K. & C.Han. 2008,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Distributive Justice: Beijing and Warsaw Compared."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3(1).

Education and Percep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Based on Structural Explanation, Relative Deprived Theory and Attribution Theory

SUN Wei-wei ZHU Xiao-yu

Abstract: Based on the view of structural explanation, relative deprived theory and attribution theory,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 in 2010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the percep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s an investment of predominant status attainment, education has an adverse effect on percep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To be specific, it is common that the group with high education level expect higher returns than what they virtually obtained, which induces the lower level of the percep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the group with higher education feel fairer by attributing their achievements to efforts, while their percep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s undermined by attribution of inequalities to privilege. It is a realistic reason that people will hardly acquire upward mobility only by enhancing education level.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attribution are the key mechanisms of social mentality.

Key words: Education; Percep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Structural Explanation; Relative Deprived Theory; Attribution Theory

(责任编辑:王水雄)